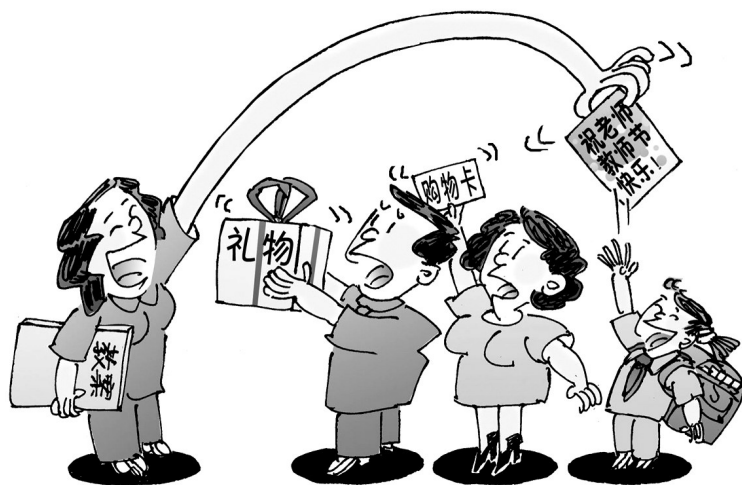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中原时评

■个论

## 讨论教师节时,我们该关注什么



蕊跃新图

今天是2013年9月10日,第29个教师节。仿佛某种周期律,教师节成“送礼节”的争议话题又起,有专家呼吁,尽快完善相关监管制度,打破无奈的“潜规则”,莫让金钱玷污了师生之情。(见今日本报相关报道)

教师节送礼现象,实际上存在地域和校际差别。在农村,留守学生们的父母常年不在身边,何来给儿女的教师送礼一说?至于城市,送礼现象可能也多发生在重点学校,因为“重点”意味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,由此必然导致部分家长穷尽手段的“争取”,送礼行为也就随之发生。

家长在教师节送礼,是失衡教育资源分布下的自我安排,可能并无用处,但足以求得安心。明乎此,就不难明白送礼成风说背后,隐藏的是深

层次社会情绪。观察者们早已指出,教育过于产业化、教育成本飙升导致的公众不满和负担过重,种种制度转型期下的社会情绪,轻易被转嫁于普通教师的身上,放大并演变成这个群体的负面道德问题。

当社会舆情纷纷指责教师节成送礼节时,它本质上暗喻的是教师社会形象的整体下滑,而此种“误会”是教师的非必要承受之重。但更应该看到的是,伴随而来的指责,也不自觉地遮蔽了教师节真正应该重申和关注的话题:那就是,教师群体的尊严与权利。

对于数以千万计的广大教师,教师节首先是一个收获祝福、检视隔阂的节日,它既需要审视师德涵养,更需要追问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所由何来。于此目标下,

教师节里真正应该反复凝视的,乃是否存在能够生成“为人师者”道义感与责任感的社会土壤,社会是否以丰沛的权益保障去滋补、回报他们。厘清了这一点,教师节的安排善意才会兑现,教育事业才会执着向好。

以此对照,我们的社会显然尚未向教师们展现出足够的温情,还有数目蔚为惊人的教师,被阻隔在这个节日的光荣与梦想之外,尊严与权利难以被保障,让教师节的光环黯然。云南代课教师自杀、乡村校长感叹“村小学比县城至少差20年,县城又比北京差50年”、西部教师月薪40元……凡此种种超越公众接受底线的新闻,总促人反思教师权利复原的巨大伤痕。

讨论教师节时我们该关注什么?我们需要重申教师的均等权利,这才是完整的节日意义与指向。较之年复一年的“送礼”“师德滑坡”等教师节话题,我们真的太需要一场关乎此的话题改造。而这样的改造显然来自于两个方面,一是舆论和社会都应该拨开“送礼节”的迷雾,不再不假思索地传播;二是制度设计也必须更多一些人文关怀,别只过度开掘职业道德而忽略个体权利。在教师节这个温暖与问候的节日里,这才是理性的叙事与承担。否则,不仅教师会逢节日即被污名化,整个社会也难以从公共致敬里,获得应有的心灵洗礼。王聘

■街谈

## 不能对房租连涨44个月视若无睹

9日,国家统计局发布2013年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,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(CPI)同比上涨2.6%,环比上涨0.5%。其中,居住价格同比上涨2.6%,住房租金价格上涨4.4%。值得一提的是,住房租金自2010年以来一直保持持续上涨的趋势,已经连续44个月上涨。(9月9日新华网)

最近,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等媒体先后聚焦房租连涨,但是房租继续上涨的脚步并未因此停止。按照当下的趋势,新的纪录还将被不断改写,房租涨幅不断扩大将进一步加剧“漂一族”的生存困境。尤其是,一些大城市还在高调打击群租,被左右夹击的蚁族们,除了抱怨“涨的那点工资都给了房租”,在此之外几无还手之力。

让人困惑的是,究竟是什么支撑着房租价格连续上涨?真的只是市场规律吗?从供求上看,城市土地不断被开发,加之政府保障房建设有力推进,租房市场上的房屋供应至少不可能连续44个月减少;同样,租房需求也不会无限度越来越多。受限购限贷政策影响,很多人没有“资格”买房,确实会额外增加部分租赁需求。但即便是在一线城市,人口并没有连续44个月膨胀,为何租赁市场的“供求关系”却越来越“紧张”?

不得不说,房屋租赁市场的所谓“供求紧张”,很有点莫名其妙。换言之,房租价格不断上涨,有相当部分的人为因素存

在。一方面,对租赁房屋投资客来说,因为卖房后再买房很困难,所以会抬高租金,弥补房价因楼市调控而上涨趋缓的“损失”。另一方面,对房屋中介来说,全国住房价高量滞,房租收入成为房产中介弥补收入的重要手段,中介联手劝房东提高租价的现象大量存在。有些中介干脆当起了“二房东”赚取价差,直接助推了租价虚高。

借用一个由头炒作一个概念,进而推动某种商品非理性猛涨,这在农产品市场上很常见,“蒜你狠”“姜你军”都属此类。当然,房租连涨44个月,究竟是正常合理的市场博弈,还是别有用心价格炒作,仍需要有一个深度的调查。但无论如何,房租猛涨不能涨得不明不白,相关机构对农产品上涨高调举起《价格法》,也该在商品房租售领域有所作为。

房子买不起也许不至于流离失所,可如果连租房都租不起,那就真的该有人流浪街头了。租房市场是最为刚性的需求,相关方面不能对房租连涨44个月视若无睹。有鉴于此,相关机构在制定楼市调控政策时,还应尽量顾及对租房市场的影响。比如限购限贷、打击群租等政策,虽起到了调控作用,但亦给房产中介炒作房租上涨提供了空间。因而,如何更好地调控房地产市场,防范房产调控政策之于租房市场的“副作用”,应提前纳入政府宏观调控的决策程序。盛翔

■个论

## “打人辞退”难解城管执法矛盾之重

武汉市城管委9月8日出台《城管员工作守则及考核办法》。今后,执法过程中出现辱骂、殴打管理相对人行为的城管员将被严肃追责直至辞退;统一对执法队员、协管员、市容监督员的考核标准,杜绝“出事就是临时工”现象。(9月9日《人民日报》)

事实上,不仅武汉摆出“城管辱骂、殴打执法对象辞退”的姿态,其他地方也在采取措施化解城管执法矛盾。比如,组建美女城管队、妈妈城管队,给城管放情绪假,用眼神执法、围观执法等。但是城管粗暴执法问题由来已久,根源复杂。要切实转变城管作风,还需要配套制度做支撑。如果没有城管制度改革的跟进,即便一些地区挥出了“打人辞退”重拳,也难解城管执法矛盾之重。

城管野蛮执法的根源在哪里?在我看来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方面,部分城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缺乏耐心,“执法经济”思维作怪,

执法方法简单粗暴,导致强制执法演变成野蛮执法。另一方面,个别执法对象法律意识淡薄,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在信息上不对称、地位上不平等,彼此对执法标准的理解有分歧。

除了城管作风粗暴以外,城管执法权力泛化是重要原因之一。从当前的城管体制来看,城管无所不管。可以说,没有一个部门、机构的权力,像城管这样集中、密集地与基层公众打交道。城管执法权力过于集中,与执法对象密切接触,难免扩大矛盾面,甚至造成权力失控的风险。

何况,多数城管人员系聘用人员,并非公务员,根本不具备执法资格。让一群没有执法资格的人参与一线执法,名不正言不顺,小摊贩能答应吗?正如昆明某区城管局长乔兵所言:单靠城管人员的末端执法,罚不出个好秩序。城市既要环境清清爽爽,又要城管文明执法,对于

饱受诟病的城管执法生态是一个考验。“城管打人辞退”能否承受城管体制缺陷之重,有待观察。

因此,要改善城管执法形象,除了要求城管文明执法以外,更要从体制上对泛化的城管权力“动手术”,变管理为服务。比如,学习部分城市开放摆摊的管理经验,城管与摊贩换位思考,建设性地解决这部分民众的生活难题。如果城管工作耐心细致,摊贩的生存权利有保障,不用给城管戴“辞退”紧箍咒,城管执法矛盾也会小很多。

对城市管理者而言,在城市环境与摊贩生活尊严之间找到平衡点,十分重要。如果城管体制不改,城管“执法经济”思维不打破,执法权力得不到规范;如果城市管理“洁癖”思维仍在作祟,容不下便民摊贩,小摊贩的地位与权利继续模糊下去,低收入群体利益不能获得制度保障,城市管理依然走不出执法矛盾怪圈。叶祝颐

■街谈

## 50元也是对见义勇为的一种激励

近日,广东佛山一名女子产后抑郁跳江自尽,数十人围观,最终却是一位流浪汉冒险跳入水中,将女子救到河边。事后被救女子老公给救人者50元,让他买药打车。(9月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,流浪汉大都好吃懒做;因此,流浪汉经常遭遇社会歧视,成为被排斥的边缘化群体。这一次,一个经常被遗忘乃至被漠视的流浪汉,以行为反差超越了人们的角色期望,再次诠释了见义勇为。被救者家属给予流浪汉的50元,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,引发人们对见义勇为是否需要回报、需要何种回报的讨论与反思。

勇救落水者,属于典型的利他行为。与市场化的商品交易不同,利他行为对获救者的义务不做明确的规定,对回报不做讨价还价,将回报的决定权留给受惠者。换言之,“好人有好报”作为一种约定俗成、心照不宣的规则,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的良知和道德自觉。一旦这种潜在的回扣机制被摒弃,利他行为的动力就会逐渐下降。

面对女子落水,数十人选择做“看客”,这样群体性的麻木与冷漠,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已经屡见不鲜。世界知名的公共治理专家奥尔森认为,为了克服人们在公共事务上互相推诿的“搭便

车困境”,行之有效的治理之道就是“选择性激励”,即有区别地对集体中的个体进行激励。

对他人的困境有着敏感的反应能力,当他人需要正义行动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,这位在经济上穷困的流浪汉,登上了“道德高地”。对于流浪汉的见义勇为,被救者家属口头表示了感谢。当流浪汉表示怕感冒要回去换衣服的时候,被救者家属给了50元钱,让流浪汉“买药并打车回去”。由此可见,被救者家属是真心实意地感谢流浪汉的义举。

在许多人看来,对生活窘迫的流浪汉来说,50元的物质激励,太过单薄,起不到什么作用。然而必须正视,在普通人的道德图景里,依然保留着“好人有好报”的朴素情怀;见义勇为并没有和回报多寡画等号,只要能够让见义勇为者感受到尊重与社会认同,即使只有50元钱,也同样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。

真正的见义勇为者,不会去权衡成本和收益的效用问题,更不会试图通过帮助别人来改善生存处境。但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,政府奖掖和倡导见义勇为行为,社会力量给予“好心人”人文关怀和经济帮扶,健全见义勇为的保障机制,才会给人们更多前行的动力。杨朝清